

家庭关爱的力量：子女数量对创业决定的影响^{*}

王菁 张锐

内容提要：本文以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家庭生育水平与创业行为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性别角色分工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家庭子女人数与创业可能性是正相关关系，随着家庭子女人数的增加，家庭创业的可能性增大；第二，社会经济地位负向调节子女人数与创业可能性的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中子女人数与创业可能性正相关关系增大；第三，性别角色分工正向调节子女人数与家庭创业活动的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不平等的家庭，角色分工越平等的家庭中子女人数对创业可能性正向影响作用增大。

关键词：子女人数 创业 社会经济地位 性别角色分工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词是创新。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个人的职业发展和事业开拓，创业是常态。创业对于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就业岗位的提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在欧美国家还是在中国，中小创业企业都是推动就业净增长的重要力量(Haltiwanger et al, 2013; McMillan & Woodruff, 2002; Banerjee & Newman, 1993)。然而，创业涉及经济个体的职业选择。有研究表明，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新创企业在最初五年之内面临着破产风险(Aldrich & Ruef, 2006)。这种高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创业活动让很多人都望而却步。

由于个体嵌入在特定社会关系之中，其行为和选择受到社会关系的激励和约束(George et al, 2016)。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看，家庭是中国社会关系的核心和完美化身。家庭对于个人身体、情感和社会稳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Khayesi et al, 2014; Kiggundu, 2002)。大量学者从家庭的视角探讨了家庭资产、家庭关系等对创业者的资源获取、创

业行为和绩效的关键性影响作用(Ruef et al, 2003; George et al, 2016; 吴晓瑜等, 2014; Khavul et al, 2009; Khayesi & George, 2011)，而且这种影响力在传统父权至上的社会环境下更为突出(Khayesi & George, 201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稳固、家庭资金禀赋的增加、资源获取等将促使个体创业行为，推动了我们对于家庭在创业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但是它们仍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家庭子女数量关系着家庭的方方面面，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大约 1/4 的中国家庭仅有一个孩子，在独生子女或是无子女的家庭中家庭成员的关系也更为简单，而在 2014 年以来二胎政策的逐步放开，家庭生育则将发生较大的改变，从而对新商业机会的产生、家庭创业决策和资源调动等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当前关于家庭生育水平和家庭创业关系的研究仍较少。其次，虽然传统的家庭观念对当今社会仍有深远影响(如“子女应尊敬父母，遵守礼节”“男主外，女主内”)，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步深入，使得家庭构成、人们在家庭中的关系、角色分工更加多元化，这种价值观念的变

^{*} 王菁、张锐，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邮政编码：310023，电子邮箱：wxh5112@163.com。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文化和能力形成技术的家庭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研究”(13YJC790204)、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期望绩效反馈视角的企业研发行为研究——以浙江省制造企业为例”(LQ17G020010)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迁也会对家庭生育与创业决定造成影响。再次,与欧美家庭相比,中国家庭无论是在人口结构,还是思想观念等方面都有着自己十分独特的东西,以欧美国家家庭为对象的相关研究成果是否适合我国仍有待研究。最后,大量关于社会关系、资源与创业行为的研究中,更加强调富裕的家庭收入、稳定的社会关系对创业行为的正向影响,然而现实中,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都处于转型中,创业活动却更加频繁,由此可见,在资源匮乏的情境下,个体也有可能具有较高的创业行为。

本文重点探讨问题为: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家庭生育水平对创业决定有什么样的影响?较低的生育水平是否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促使家庭可以配置更多的财力和精力于创业活动中?抑或这种较低的生育率成为减弱创业动力的原因之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角色分工在两者关系中具有怎样的调节作用?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家庭子女人数与创业决定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夫妻角色分工对他们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家庭生育与创业决定

创业是一项风险性较高的活动,需要个人投入较多的资金和精力。虽然一些文献提及较少的子女人数,使父母在抚育子女上承担较少的经济和情感责任,更可能放弃稳定工作和薪水,开展创业活动(Aldrich & Renzulli, 2000; Aldrich & Cliff, 2003)。但是本文认为,在中国家庭中生育水平和创业的可能性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主要因为:

家庭中无论是养育幼年子女还是提高成年子女社会竞争力(如婚姻市场、劳动力市场等)都需要扩大家庭收入、留下更多的财富。虽然在标准的家庭生育理论中,家庭的生育成本主要体现为父母劳动时间的减少(Becker, 1960)。然而, Angrist & Evans (1998)、Li et al (2015)、Caceres-Delpiano (2012)都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减少父母的劳动供给。Pencavel (1986)也指出,由于家庭规模的扩大,需要抚养的人口增加,能激励父母去从事报酬更为丰厚的职业并更加努力工作,以获得较高的收入缓解家庭的生存压力。与传统职业相比,创业是具有高风险和高财务回报潜力的职业。贾生华、邬爱其(2006)指出中国人经济收入水平还普

遍不高,创业往往是由贫困推动的。Wei & Zhang (2011)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生育性别比例失衡,存在男多女少的现象,使得生育了男孩的父母试图通过创业以实现家庭收入的向上流动,以提高孩子在今后婚恋市场上的竞争力。由此可见,父辈为了子辈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将有较强的动力开展创业活动。

本文采用简化的两代代际交替模型(OLG)分析父母生育子女和职业选择决策的收益和成本。基本设定:(1)两代代际交替模型(OLG),每个家庭只具有单一的效用函数,家庭子女在年幼时不消费,成年后选择职业,获得收入,在此基础上进行消费并决定是否为子女留下遗产。(2)为了简化分析,将职业选择简化为所承担风险的程度,记为 η ,风险工作能够带来的(预期)收入记为 $w(\eta)$,风险收入函数为严格递增的凹函数,即 $w'(\eta) > 0$, $w''(\eta) < 0$ 。风险承担会为家庭带来负效用, $\lambda(\eta)$,风险负效用为单调递增凸函数,即 $\lambda'(\eta) > 0$, $\lambda''(\eta) > 0$ 。(3)家庭在获得收入以后,需要在消费、养育子女和遗产三个方面进行资源配置。家庭的效用函数 $u(c)$ 为单调递增的凹函数即 $u'(c) > 0$, $u''(c) < 0$ 。同时,子女能够为家庭带来正效用,其他情况给定时,子女人数(n)越多,家庭获得效用越大。(4)抚育子女需要成本,为了简化分析,假定每个子女的抚育成本是外生给定,为 i 。(5)家长会关心子女未来的生活状况,即家长会自己的效用函数中为子女的效用函数赋予一定的权重。在这一模型设定的基础之上,家庭的最优化问题可表达为(1)(2)两式。

$$\text{Max} V(b) = u(c) - \lambda(\eta) + \delta n^\theta V(b') \quad (1)$$

$$\text{s. t. } (1+r)b + w(\eta) = c + b' + ni \quad (2)$$

这一最优化问题刻画了对子女具有利他偏好家庭的最优决策问题(Becker & Barro, 1988)。其中, r 为市场利率, δ 为家庭赋予子女效用函数的权重, n^θ 为家庭对子女人数赋予的效用权重。Becker & Barro (1988)认为如果给定每个子女所能获得的效用,家长效用函数是关于子女人数的严格递增凹函数,即 $0 < \theta < 1$,但是这一假定条件在中国背景下就显得不是那么合理。中国家庭有“多子多福”等观念,体现出了非常显著的子女数量偏好。中国传统观念通常认为子女的数量越多,父母也会越幸福。一般来讲,子女可以给父母带来正效用:首先,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可以满足父母的感情需要,从而可能会提高父母的心理健康;其次,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子女可以为父母的老年生活

提供养老保障;除此之外,家庭规模越大,承担风险的能力越强,较高的生育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父母面对的各种风险(例如,在父母生病时,多子女家庭可能能够提供更好的照料)(耿德伟,2013)。郭志刚、张恺梯(1996)研究指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子女供养老年人仍是我国代际经济流动的主流,子女数量对于老年人家庭供养存在显著的作用。陈卫、杜夏(2002)研究发现子女对老年人的居住状况和生活照料具有一定影响,具体而言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和经济供养主要受儿子的影响,而女儿会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状况产生更多的正面影响。乐章、肖荣荣(2016)则认为多子女会增加老人对晚年生活的整体幸福感。因此,本文假定 $\theta > 1$, $V(\cdot)$ 为值函数。一阶条件为:

$$u'(c) = \mu \quad (3)$$

$$\theta \delta n^{\theta-1} V(b') = \mu i \quad (4)$$

$$\delta n^{\theta} V'(b') = \mu \quad (5)$$

$$\lambda'(\eta) = \mu w'(\eta) \quad (6)$$

(3)~(6)式中, μ 为拉格朗日乘数, $V(b') > 0$, $V'(b') > 0$ 。基于一阶条件,可以对生育率、职业选择以及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将(6)式代入(5)式可得(7)式。

$$\delta n^{\theta} V'(b') = \frac{\lambda'(\eta)}{w'(\eta)} \quad (7)$$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家庭生育率上升,即 n 增加时,(7)式左侧增大,这意味着(7)式右侧也必须增大。更为正式地,本文对(7)式两侧同时取关于 n 的微分,化简后可以得到(8)式。

$$\frac{\partial \eta}{\partial n} = \frac{\theta \delta n^{\theta-1} V'(b') w'(\eta)}{\lambda''(\eta) - \delta \theta n^{\theta-1} V'(b') w''(\eta)} \quad (8)$$

由于 $w''(\eta) < 0$ 、 $\lambda''(\eta) > 0$, 有 $\frac{\partial \eta}{\partial n} > 0$, 即当家庭子女数量增加的时候,家庭愿意承担风险更高的工作,个体创业的可能性增强。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子女人数与个体创业决定呈现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子女人数的增多,个体创业的可能性增大。

(二)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生育和创业选择关系的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存在是社会竞争与斗争的结果,也是促进个体与社会群体积极向上,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性。本文认为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子女人

数对创业决策的正向影响作用将增强。这主要是因为: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通过创业带来收入的增加对子女未来边际效用提高的程度减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父辈的创业决定。反之,在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中这种效用将增强,促使父辈有更强的动力从事创业活动。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子女无论是健康状况(Chen et al,2006;Parcel & Menaghan,1993)、受教育的程度(郭丛斌、闵维方,2006)还是社会情绪适应性(Chen & Paterson,2006)等都比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子女差。较低的家庭收入、匮乏的资源都将对子女教育、成绩产生负面影响(赵颖,2016;Dahl & Lochner,2012)。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由于受到资源的限制在养育子女方面投入较少,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则往往不仅对子女有更高的花费和投资(Mookherjee et al,2012),而且也能够向子代传递更多的社会和财务资本。因此,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对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而言,父辈为了提高子女品质而承担更高风险工作的动力减弱了。将(6)式代入(4)式可得(9)式:

$$\theta \delta n^{\theta-1} V(b') = \frac{\lambda'(\eta)}{w'(\eta)} i \quad (9)$$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9)式右侧的抚育子女成本 i 值则越大。此时,当生育率提高时,由于 $\theta > 1$, 有 $n^{\theta-1} > 0$ 增加,等式(9)左侧的值增大。同时,等式右侧的值也应相应增大。更为正式地,本文对于(9)左右两侧同时取关于 n 的微分,化简后可得(10)式。

$$\frac{\partial \eta}{\partial n} = \frac{\theta(\theta-1)\delta n^{\theta-2} V(b') w'(\eta)}{\lambda''(\eta) - \delta \theta n^{\theta-1} V'(b') w''(\eta)} \quad (10)$$

因为 $w''(\eta) < 0$ 以及 $\lambda''(\eta) > 0$, 所以 $\frac{\partial \eta}{\partial n} > 0$ 仍然成立,这说明在理论上来看,子女数量提高家庭创业倾向的结论非常稳健。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抚育子女成本(i)更高。因此,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数目和家庭创业倾向这一关系的影响作用,只需确定 $\frac{\partial(\partial \eta / \partial n)}{\partial i}$ 的符号即可。

对(10)式求关于 i 的导数,可得 $\frac{\partial(\partial \eta / \partial n)}{\partial i} = \frac{-\theta(\theta-1)\delta n^{\theta-2} V(b') w'(\eta) \lambda''(\eta)}{(\lambda''(\eta) i - \delta \theta n^{\theta-1} V'(b') w''(\eta))^2} < 0$ 。这意味着,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子女数量对于家庭创

业倾向的正向影响将下降。因此,本文认为家庭生育率增加时,相较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更愿意承担高风险的工作,创业动力更强。据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社会经济地位负向调节子女人数与个体创业活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子女人数对创业可能性的正向影响更大。

(三)夫妻角色分工平等程度对家庭生育和创业选择关系的影响

家庭角色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丈夫与妻子间的权力关系(Blood & Wolfe,1978;Heer,1963; Manser & Brown,1980)。在传统的分工模式下,丈夫在经济分配、劳动分工及对外交往等事物决策中拥有指挥权,而妻子则更多的是执行丈夫的决定(张艳霞,2009)。反之,在夫妻角色分工较为平等的家庭中,丈夫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妻子则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本文认为相对于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模式,在夫妻角色分工更为平等的家庭中,养育子女的成本将减少,促使子女人数对创业可能性正向影响作用增大。这主要因为:

角色分工观念更为平等的家庭,尊重每个个体自己的偏好和效用方程,有利于夫妻就双方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花费的时间和劳动力进行协商而达到了一种合理分配,使得整个家庭的效用达到最大化(Becker,1991)。传统的夫妻角色分工观念认为“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等,导致了男性更多在外工作,而女性则减少劳动力市场供给时间,承担更多的家务。但是,这种分工模式可能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导致整个家庭效用损失。从工作能力本身来说,除了个别对体力要求较高的职业之外,大多数情况下男女劳动能力没有显著差异,而且随着劳动工具和作业环境分别朝着自动化、袖珍化和人性化方向发展,女性在劳动能力方面日益显示出不亚于男性的特征(张抗私,2009)。因此,相对于传统角色分工的家庭,在角色分工较为平等的家庭中,丈夫和妻子更可以根据自身偏好、能力和效用等合理分配劳动市场劳动供给、抚育子女和家务时间等。夫妻双方都可以以较高的效率参与到子女的养育过程中,增强了灵活性,降低了抚育子女的成本。另外,在夫妻角色分工较为平等的家庭中,妻子在家庭资源分配、劳动分工等决策上往往具有一定的发言权。而

女性常常比男性恶习更少,在酗酒、赌博等活动中开销较少(Kalichman et al,2007),也更有效率的配置家庭资源(George et al,2016;Karlan & Zinman,2011)。

相对于传统角色分工模式,夫妻角色分工较为平等的模式下抚养子女的成本降低。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夫妻角色分工平等程度越高的家庭(9)式右侧的抚育子女成本*i*值越低。根据之前分析,有
$$\frac{\partial(\partial\eta/\partial n)}{\partial i} = \frac{-\theta(\theta-1)\delta n^{\theta-2}V(b')w'(\eta)\lambda''(\eta)}{(\lambda''(\eta)i - \delta n^{\theta-1}V'(b')w''(\eta))^2} < 0$$
成立。此时,由于夫妻角色分工越平等的家庭抚育子女成本(*i*)越小,这将提升 $\partial\eta/\partial n$ 的值,使得子女数目对家庭创业倾向的影响作用进一步强化。所以,本文认为家庭生育率增加时,相对于传统角色分工家庭,性别角色分工较为平等的家庭更愿意承担高风险的工作。据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性别角色分工正向调节子女人数与个体创业活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传统角色分工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平等家庭的子女人数对创业可能性正向影响作用增大。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CGSS2013。CG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组织实施的连续性全国调查。项目研究访问的对象是根据随机抽取的方法,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抽取家庭户,然后在每个被选中的家庭户中按照一定规则随机选取1人作为被访问者。在CGSS2013对外公开的数据中,包含了家庭生育情况、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家庭收入、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个人、父母和配偶工作状况等。CGSS2013数据库一共有11438个样本。关于被访问者工作状况的问题是“下列各种情形,哪一种更符合您目前工作的状况”,有回答的有4612个样本,其中“拒绝回答”的有12个、“不知道”的有1个。本文剔除了“拒绝回答”和“不知道”的样本,得到4599个样本。在此基础上,结合研究所需,进一步筛选和剔除了子女人数、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角色分工、性别、婚姻、年龄、教育、家庭财务资本、社会网络、户口等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样本4246个。

(二)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子女人数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借鉴以

往关于创业选择的研究(Minns & Rizov, 2003; 陈刚, 2015; 阮荣平等, 2014), 本文设定的 probit 模型为:

$$\Pr(\text{Entr} = 1) = G(\alpha + \beta_1 \text{Child} + \beta_2 \text{MD} + \beta_3 \text{Child} \times \text{MD} + \beta_4' K + \varepsilon) \quad (11)$$

其中, Entr 是模型(11)的被解释变量, 第 i 个受访者是否创业。Child 是解释变量, 表示第 i 个受访者的子女个数, 数值越大意味着子女数量越多。调节变量 MD 包括了社会经济地位(SES)、性别角色分工(ASSIGN)。模型中还控制了可能对是否创业造成影响的变量 K, 包括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社会资本、财务资本等。另外, 本文模型中还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

(三) 关键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创业(Entr)。关于工作状况, CGSS(2013)将受访者分为了 8 类:(1)受雇于他人(有固定雇主);(2)零工, 散工(无固定雇主的受雇者);(3)在自己家的生意/企业中工作/帮忙, 不领工资;(4)在自己家的生意/企业中工作/帮忙, 领工资;(5)劳务工/劳务派遣人员;(6)自己是老板(或者是合伙人)(7)个体工商户;(8)自由职业者。本文参考陈刚(2015)的研究, 将“自己是老板(或者是合伙人)”、“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都视为创业活动。根据这个定义, 2013 年创业者所占的比重为 21.73%。

2. 主要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子女人数(Child)。在 CGSS(2013)数据中, 涉及的问题是:“您有几个儿子”“您有几个女儿”。本文根据回答, 将儿子个数与女儿个数相加后作为子女的总人数。

3. 调节变量。(1)社会经济地位(SES)。在 CGSS(2013)数据中, 涉及的问题是:“与同龄人相比, 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按照“较高”“差不多”“较低”三种回答, 分别赋值为 1, 2, 3。该值越大, 表示社会经济地位越低, 反之则越高。(2)性别角色分工(ASSIGN)。在 CGSS(2013)数据中, 涉及的问题是:“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经济不景气时, 应先解雇女性员工”。按照“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赋值为 5, 4, 3, 2, 1。本文将以上问题得分相加后取均值作为性别角色分工的代理变量。该值越大, 表示性别角色分工越

平等。

4. 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个人特征。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等是影响个人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Minniti & Nardone, 2007; Verheul et al, 2006; 陈刚, 2015; 阮荣平等, 2014)。性别(male)设置为虚拟变量, 男性赋值为 1, 女性赋值为 0; 年龄(Age)是受访者在接受访问时的周岁年龄; 教育(Edu)和教育平方(Edusq), 教育(Edu)是按照受访者最高教育程度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到“研究生以上”13 个等级分别赋值为 1~13; 婚姻(Marr)设置为虚拟变量, “同居”“初婚”“再婚”为 1, 其他为 0; 中共党员(Comm)设置为虚拟变量, 受访者是中共党员时为 1, 其他为 0。户籍(Loca)设置为虚拟变量, 农村户口为 1, 其他为 0。(2)个人资源。个人财务资本、社会资本与创业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Arenius & Minniti, 2005; Minniti & Nardone, 2007; Klyver & Hindle, 2007; De Clercq et al, 2013; 陈刚, 2015; 阮荣平等, 2014)。参照 De Clercq et al, (2013)、陈刚(2015)的研究, 财务资本(Distr)按照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的“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分别赋值 1, 2, 3, 4, 5; 父母创业(Pentr)设置为虚拟变量, 当父亲或母亲是创业者时为 1, 其他为 0; 社会网络变量(Net)以在过去一年中, 因度假或探亲访友而没在家过夜的次数代表。(3)省份的虚拟变量, 属于特定省份时为 1, 其他为 0。变量具体定义如表 1 所示。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检验思路为:首先, 分析子女人数对创业行为决策的影响; 其次, 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夫妻角色分工对子女人数和创业可能性关系的调节机制; 最后, 稳健性检验。表 2 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在创业行为方面, 通过对比子女人数少的样本组和子女人数多的样本组可以看出, 子女人数少的样本均值(0.184)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低于子女人数多的样本均值(0.315)。在随后的相关性统计分析中, 子女人数与创业可能性的相关系数为 0.190, 在 1% 的水平显著(限于篇幅, 正文中未列出相关系数表)。分组检验和相关统计分析结果, 初步验证了子女人数和创业可能性间的正相关关系。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创业	Entr	“个体户”“自己是老板(或者是合伙人)”“自由职业者”选项者视为创业者,为1,其他选项视为非创业者,为0。
子女人数	Child	儿子个数与女儿个数加总。
社会经济地位	SES	“与同龄人相比,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将“较高”赋值1、“差不多”赋值2、“较低”赋值3。
性别角色分工	ASSIGN	“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经济不景气时,应先解雇女性员工”。按照“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赋值为5,4,3,2,1。将问题得分相加后取均值。
性别	Male	男性为1,女性为0。
年龄	Age	受访者在接受访问时的周岁年龄。
中共党员	Comm	中共党员为1,其他为0。
教育	Edu	按照受访者最高教育程度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到“研究生以上”13个级别分别赋值1~13。
财务资本	Distr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按照“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分别赋值1,2,3,4,5。
父母创业	Pentr	设置为虚拟变量,当父亲或母亲创业,为1,其他为0。
社会网络	Net	以在过去一年中,因度假或探亲访友而没在家过夜的次数代表。
婚姻	Marr	设置为虚拟变量,“同居”“初婚”“再婚”为1,其他为0。
户籍	Loca	设置为虚拟变量,农村户口为1,其他为0。

注:根据 CHFS 2013 年调查数据整理而得。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家庭生育水平						t 检验 (2)-(3)
	全样本		子女人数少		子女人数多		
	Mean(1)	S. D.	Mean(2)	S. D.	Mean(3)	S. D.	
Entr	0.218	0.413	0.184	0.388	0.315	0.465	-0.131***
SES	2.310	0.556	2.299	0.546	2.325	0.569	-0.026**
ASSIGN	3.076	0.790	3.192	0.793	2.918	0.759	0.274***
Male	0.503	0.500	0.525	0.499	0.474	0.499	0.051***
Edu	4.896	3.051	5.816	3.210	3.653	2.298	2.163***
Age	48.779	24.648	41.838	14.348	58.148	31.576	-16.310***
Distr	2.684	0.680	2.721	0.667	2.635	0.695	0.086***
Marr	0.794	0.404	0.760	0.427	0.840	0.366	-0.080***
Comm	0.101	0.302	0.108	0.310	0.092	0.289	0.016***
Net	1.765	1.241	1.934	1.337	1.538	1.056	0.395***
Pentr	0.050	0.218	0.066	0.248	0.029	0.167	0.037***
Loca	0.554	0.497	0.479	0.500	0.656	0.475	-0.177***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0$ 。

(一) 回归检验结果

表3检验了子女人数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1)首先进入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作为基准模型,在后续的模型(2)的检验中,加入解释变量(子女人数)进行回归。模型(2)的检验结果显示,子女人数与创业行为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子女人数越多,创业可能性越大,支持了本文假说1。

模型(3)报告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人数与创业行为之间关系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

子女人数与创业行为是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社会经济地位和子女人数的交互项与创业行为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了形象地说明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绘制了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效应图(图1左)。图1左中,横轴从左至右,随着子女人数的增加,创业可能性逐步增强,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相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中,子女人数驱动家庭创业行为的幅度增强。本文假说2得到了验证。

模型(4)报告了性别角色分工对子女人数与创

表3 子女人数与创业关系检验结果

	(1)	(2)	(3)	(4)	(5)
子女人数		0.269*** (0.000)	0.277*** (0.000)	0.275*** (0.000)	0.284*** (0.000)
子女人数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项			0.071** (0.041)		0.082** (0.021)
子女人数与性别角色分工的交互项				0.089** (0.020)	0.099*** (0.007)
社会经济地位	-0.086*** (0.001)	-0.084*** (0.002)	-0.062** (0.032)	-0.084*** (0.002)	-0.059** (0.042)
性别角色分工	-0.032 (0.196)	-0.023 (0.349)	-0.023 (0.360)	0.007 (0.815)	0.010 (0.708)
性别	-0.014 (0.768)	-0.004 (0.925)	-0.004 (0.937)	-0.009 (0.849)	-0.009 (0.855)
教育	0.301** (0.021)	0.364*** (0.006)	0.390*** (0.003)	0.338** (0.010)	0.365*** (0.006)
教育平方	-0.507*** (0.000)	-0.551*** (0.000)	-0.577*** (0.000)	-0.527*** (0.000)	-0.556*** (0.000)
年龄	0.100* (0.094)	-0.055 (0.409)	-0.046 (0.492)	-0.058 (0.382)	-0.047 (0.472)
财务资本	0.168*** (0.000)	0.171*** (0.000)	0.175*** (0.000)	0.171*** (0.000)	0.176*** (0.000)
婚姻	0.319*** (0.000)	0.188** (0.013)	0.186** (0.014)	0.170** (0.026)	0.167** (0.028)
中共党员	-0.452*** (0.000)	-0.454*** (0.000)	-0.454*** (0.000)	-0.455*** (0.000)	-0.454*** (0.000)
社会网络	0.055** (0.021)	0.064*** (0.007)	0.065*** (0.007)	0.063*** (0.008)	0.064*** (0.008)
户籍	0.282*** (0.000)	0.217*** (0.000)	0.218*** (0.000)	0.220*** (0.000)	0.222*** (0.000)
父母创业	0.267*** (0.005)	0.264*** (0.006)	0.267*** (0.005)	0.271*** (0.005)	0.275*** (0.004)
常数项	-1.121*** (0.000)	-1.194*** (0.000)	-1.195*** (0.000)	-1.193*** (0.000)	-1.192*** (0.000)
省份	Yes	Yes	Yes	Yes	Yes
R ²	0.099	0.106	0.107	0.107	0.108

注：N=4246。***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模型结果均是经过 Robust 整后的结果，括号内为 p 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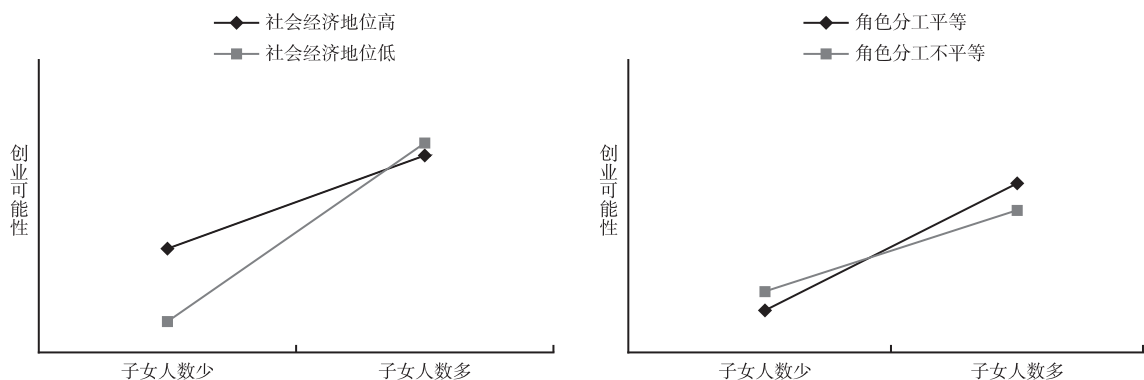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经济地位(左)和夫妻角色分工(右)的调节效应图

业行为之间关系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子女人数与创业行为是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性别角色分工和子女人数的交互项与创业行为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了形象地说明性别角色分工的调节作用，绘

制了性别角色分工的调节效应图(图1右)。图1右中，横轴从左至右，随着子女人数的增加，创业可能性逐步增强，与“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角色分工的家庭相比，在性别角色分工较为平等的家庭中，子女人数驱动家

庭创业行为的幅度增强。本文假说3得到了验证。

(二) 内生性

准确估计基准模型可能面临着内生性问题。如由于影响子女数量的变量很多,其中有不少不可观测的变量可能同时也会影响到创业决定。另外,不但子女人数会对创业产生影响,也可能存在一种相反的机制,即创业也会影响到子女数量。为此,本文选择第一胎子女性别作为家庭子女数量的工具变量,对这一问题进行纠正。第一胎子女性别设置为虚拟变量,当第一胎子女性别为女时为1,其他为0。在中国,“重男轻女”是个长久以来就存在的现象,而且男孩偏好东亚地区普遍存在,没有生育男孩的家庭往往会选择多生子女,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严格执行的某些农村地区(Qian, 2009)。因此,第一个子女是影响子女数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子女的性别通常是随机决定的。这使得该变量相对于个体创业行为具有较强的外生性。

从表4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胎子女性别对子女人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可以认为,第一胎子女性别作为子女人数的工具变量应该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剔除内生性以后,子女人数对创业决定是正向的影响作用,在1%的水平上依然具有统计显著性。

本文有两个调节变量,分别是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角色分工。在这里本文通过分组回归的方法进行后续的检验。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在CGSS(2013)数据中,涉及的问题是:“与同龄人相比,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按照“较高”“差不多”“较低”三种回答,分别赋值为1,2,3。该值越大,表示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反之则越高。本文把社会经济地位按照受访者的回答是否是“较高”分成两个样本组。在CGSS(2013)数据中,关于性别角色涉及的问题是“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经济不景气时,应先解雇女性员工”。按照“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赋值为4,3,2,1。本文将四项得分相加后取均值作为性别角色分工的代理变量,同时将低于或等于中值3的样本作为性别角色分工不平等组,其他样本归为平等组。

从表5的(1)(3)(5)(7)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胎子女性别对子女人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所使用的工具变量对子女人数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5模型(2)的检验结果显示,在社会经济地

位较高组,子女人数与创业决定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模型(4)的检验结果则显示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组,子女人数与创业决定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子女人数越多,创业可能性越大。本文采取Chow test对比两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性。 $\chi^2=5.84$,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相较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中,子女数量对创业决定的正向影响作用增强,支持了假设2。模型(6)(8)的检验结果显示,在性别角色分工平等组,子女人数与创业决定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性别角色分工不平等组,子女人数与创业决定也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通过Chow test对比两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chi^2=3.08$,在10%的水平下显著。结果表明相较于性别角色分工不平等家庭,在角色分工平等家庭,子女人数对创业决定的正向作用越强,支持了假说3。

表4 子女人数与创业 IVPROBIT 估计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子女人数		0.391*** (0.002)
第一胎性别	0.604*** (0.000)	
社会经济地位	-0.005 (0.522)	-0.083*** (0.002)
性别角色分工	-0.024*** (0.001)	-0.020 (0.418)
性别	-0.048*** (0.000)	0.001 (0.990)
教育	-0.218*** (0.000)	0.391*** (0.004)
教育平方	0.153*** (0.000)	-0.568*** (0.000)
年龄	0.547*** (0.000)	-0.121 (0.192)
财务资本	-0.001 (0.914)	0.170*** (0.000)
婚姻	0.442*** (0.000)	0.127 (0.183)
中共党员	0.004 (0.824)	-0.453*** (0.000)
社会网络	-0.023*** (0.000)	0.066*** (0.005)
户籍	0.196*** (0.000)	0.188*** (0.003)
父母创业	0.024 (0.352)	0.262*** (0.006)
常数项	0.111 (0.376)	-1.214*** (0.000)
省份	Yes	Yes

注:N=4246;***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模型结果均是经过Robust整后的结果,括号内为p值。

表5 子女人数与创业分组 IVPROBIT 估计

	社会经济地位				性别角色分工			
	高组		低组		平等组		不平等组	
	(1)	(2)	(3)	(4)	(5)	(6)	(7)	(8)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子女人数		-0.925* (0.092)		0.435*** (0.001)		1.365*** (0.010)		0.388** (0.032)
第一胎性别	0.610*** (0.000)		0.606*** (0.000)		0.597*** (0.000)		0.569*** (0.000)	
社会经济地位					-0.044 (0.109)	-0.003 (0.981)	-0.012 (0.320)	-0.047 (0.218)
性别角色分工	-0.033 (0.359)	-0.053 (0.613)	-0.024*** (0.001)	-0.016 (0.545)				
性别	-0.073 (0.377)	-0.054 (0.834)	-0.045*** (0.001)	-0.010 (0.839)	0.019 (0.669)	-0.145 (0.422)	-0.044** (0.041)	-0.003 (0.963)
教育	-0.069 (0.762)	-0.299 (0.570)	-0.236*** (0.000)	0.501*** (0.000)	0.138 (0.385)	-0.393 (0.473)	-0.256*** (0.000)	0.424** (0.021)
教育平方	0.034 (0.851)	-0.011 (0.980)	0.169*** (0.000)	-0.677*** (0.000)	-0.123 (0.318)	0.122 (0.786)	0.189*** (0.000)	-0.624*** (0.000)
年龄	0.831*** (0.000)	0.482 (0.371)	0.527*** (0.000)	-0.120 (0.202)	0.490*** (0.000)	-0.743* (0.065)	0.582*** (0.000)	-0.195 (0.137)
家庭财务资本	-0.047 (0.454)	0.182 (0.322)	0.002 (0.888)	0.193*** (0.000)	-0.012 (0.731)	0.011 (0.940)	-0.009 (0.645)	0.233*** (0.000)
婚姻	0.371*** (0.001)	1.455*** (0.000)	0.452*** (0.000)	0.074 (0.455)	0.460*** (0.000)	-0.295 (0.417)	0.437*** (0.000)	0.085 (0.526)
中共党员	-0.012 (0.885)	-0.526* (0.075)	0.003 (0.870)	-0.435*** (0.000)	-0.087 (0.154)	-0.424 (0.150)	-0.012 (0.701)	-0.560*** (0.000)
社会网络	0.013 (0.616)	0.043 (0.632)	-0.025*** (0.000)	0.069*** (0.006)	0.011 (0.574)	0.079 (0.366)	-0.038*** (0.000)	0.078** (0.026)
户籍	0.297*** (0.001)	0.421 (0.152)	0.189*** (0.000)	0.194*** (0.003)	0.126** (0.034)	-0.079 (0.752)	0.243*** (0.000)	0.084 (0.367)
父母创业	0.205 (0.105)	0.210 (0.647)	0.017 (0.505)	0.286*** (0.004)	-0.110* (0.097)	0.323 (0.342)	0.027 (0.570)	0.110 (0.449)
常数项	0.569 (0.350)	-1.211 (0.222)	0.063 (0.591)	-1.248*** (0.000)	0.018 (0.964)	-0.441 (0.645)	0.379** (0.015)	-1.716*** (0.000)
省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模型结果均是经过 Robust 整后的结果, 括号内为 p 值。

(三) 稳健性检验

1. 创业行为的替代变量。本文参照阮荣平等(2014)的研究, 将受访者在接受访问时“自己是老板(或者是合伙人)”“个体工商户”视为创业活动, 重新检验了表3(1)~(5)。检验结果与表3(1)~(5)基本一致。

2. 性别角色分工的替代变量。在 CGSS(2013) 数据中, 关于性别角色分工涉及的问题是: “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经济不景气时, 应先解雇女性员工”。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将这 4 个问题的得分合成一个指标 ASSIGN1。Eigenvalue 为 2.06, Proportion 为 52%, KMO 为 0.7122。重新检验结果与表3(1)~(5)的检验结果基本一致。本文将 ASSIGN1 低于或等于样本中值时归于性别角

色分工不平等组, 其他为平等组, 重新检验了表5的(5)~(8)。在性别角色分工平等组, 子女人数与创业决定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eta = 1.422, p < 0.01$)。在性别角色分工不平等组, 子女人数与创业决定也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eta = 0.406, p < 0.05$)。本文通过 Chow test 对比两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chi^2 = 3.61$, 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 与表5的(5)~(8)的检验结果基本一致。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了家庭生育水平对创业决定的影响, 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夫妻家庭角色分工在家庭生育水平和创业决定两者关系间的调节机制, 研究发现: 首先, 子女人数与创业决定呈现正相关关系, 即

随着子女人数的增多,家庭创业的可能性增大。结果表明,虽然较高的生育水平会直接影响家庭可支配收入等,限制了个体从事创业活动的财力和精力支持,但是在家庭中无论是养育幼年子女还是提高成年子女社会竞争力(如婚姻市场、劳动力市场等)都需要扩大家庭收入、留下更多的财富。这将激励父母从事报酬更为丰厚的职业,通过创业以实现家庭收入向上的流动。

其次,社会经济地位负向调节子女人数与创业可能性的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子女人数与创业可能性正相关关系增大。结果表明,比较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能够给予子女更多的投资,同时也能够向子代传递更多的社会和金融资本,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通过创业带来收入的增加对子女未来边际效用提高程度减弱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父辈的创业决定。反之,在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中则增强,促使他们有更强大的动力创业。

最后,夫妻角色分工平等程度正向调节子女人数与创业活动的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夫妻角色分工不平等的家庭,角色分工平等家庭的子女人数对创业可能性正向影响作用增大。结果表明,角色分工较为平等的家庭,丈夫和妻子更可以根据自身偏好、能力和效用等合理分配劳动供给、抚育子女和家庭务时间等,双方都可以以较高的效率参与到子女的养育过程中,增强了养育子女过程的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抚育子女的成本,提高整个家庭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家庭生育率增加,比较于传统角色分工的家庭,角色分工较为平等的家庭创业可能性更高。

长期以来,我们更加关注于具有良好社会关系、充足资源对于家庭创业行为决策的影响,然而家庭生育率的提高,促使父辈为了养育、传递社会资本和财富以提高子辈在社会上的竞争力而有更强的动机从事具有高收入潜力的创业活动。同时,由经济、社会的变迁带来人们价值观念,如夫妻角色分工的改变,也会影响人们在此过程中的创业决策选择。经济收入低的家庭往往有较高的生育率。虽然资源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创业活动,但是相对于其他家庭而言,他们通过创业带来收入的增加对子女未来边际效用提高程度增大了,具有更高的创业倾向。因此,需要我们政府重视这部分群体的创业活动,给予正确引导和政策支持,以帮助他们成功创业。

参考文献:

- 陈刚,2015:《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管理世界》第5期。
- 陈卫 杜夏,2002:《中国高龄老人养老与生活状况的影响因素——对子女数量和性别作用的检验》,《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 段志民,2016:《子女数量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统计研究》第10期。
- 耿德伟,2013:《多子多福?——子女数量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南方人口》第3期。
- 郭丛斌 闵维方,2006:《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第11期。
- 郭志刚 张恺梯,1996:《对子女数在老年人家庭供养中作用的再检验——兼评老年经济供给“填补”理论》,《人口研究》第2期。
- 贾生华 郭爱其,2006:《中美日三国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创业特征比较》,《外国经济与管理》第10期。
- 乐章 肖荣荣,2016:《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与乡村老人养老倾向》,《重庆社会科学》第3期。
- 阮荣平 郑风田 刘力,2014:《信仰的力量:宗教有利于创业吗?》,《经济研究》第3期。
- 吴晓瑜 王敏 李力行,2014:《中国的高房价是否阻碍了创业?》,《经济研究》第9期。
- 张抗私,2009:《就业性别歧视与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的交互作用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赵颖,2016:《员工下岗、家庭资源与子女教育》,《经济研究》第5期。
- Aldrich, H. E. & J. E. Cliff (2003), "The pervasive effects of family on entrepreneurship: Toward a family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8(5):573-596.
- Aldrich, H. E. & L. Renzulli (2000), "Family matters: Consequences of personal networks for business startup and survival", *Social Forces* 79(2):523-546.
- Angrist, J. D. & W. N. Evans (1998),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exogenous variation in family siz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3):450-477.
- Arenius, P. & M. Minniti (2005), "Perceptual variables and nascent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4(3):233-247.
- Banerjee, A. V. & A. F. Newman (1993),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2):274-298.
- Becker, G. S. (1960),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in: G. B. Roberts (ed),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cker, G. S. & R. J. Barro (1988), "A reformul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3(1):1-25.
- Becker, G. S. (199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Uni-

- versity Press.
- Blood, R. O. & D. M. Wolfe(1978), *Husbands and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 Greenwood Press.
- Caceres-Delpiano, J. (2012), “Can we still learn someth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and mother’s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Demography* 49(1): 151—174.
- Chen, E. et al(2006),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Do gradients differ with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2(9):2161—2170.
- Chen, E. & L. Q. Paterson(2006), “Neighborhood, family,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How do they relate to adolescent health?”, *Health Psycholog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Division of Health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5(6):704—714.
- Dahl, G. B. & L. Lochner(2012), “The impact of family income on child achievement: evidence from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5):1927—1956.
- De Clercq, D. et al(2013), “Individual-level resources and new business activity: The contingent role of institutional context”,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7(2):303—330.
- George, G. et al(2016), “Social structure, reasonable gai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frica”,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6):1118—1131.
- Haltiwanger, J. et al(2013), “Who creates jobs? Small versus large versus young”,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95(2):347—361.
- Heer, D. M. (1963), “The measurement and bases of family power: An overview”, *Marriage & Family Living* 25(2):133—139.
- Kalichman, S. C. et al(2007), “Alcohol use and sexual risks for HIV/AIDS in sub-Saharan Africa: Systematic review of empirical findings”, *Prevention Science* 8(2):141—151.
- Karlan, D. & J. Zinman(2011), “Microcredi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Using randomized credit scoring for impact evaluation”, *Science* 332(6035):1278—1284.
- Khavul, S. et al(2009), “Informal family business in Africa”,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3(6):1219—1238.
- Khayesi, J. N. O. & G. George(2011), “When does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matter? Communal orientation and entrepreneurs’ resource accumulation efforts in Africa”,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84(3):471—492.
- Khayesi, J. N. O. et al(2014), “Kinship in entrepreneur networks: Performance effects of resource assembly in Africa”,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8(6):1323—1342.
- Kiggundu, M. N. (2002), “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frica: What is known and what needs to be done”,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 7(3):239—258.
- Klyver, K. & K. Hindle(2007),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business formation”, *Small Enterprise Research* 15(1):22—38.
- Li, H. et al(2015), “Fertility, household structure, and parental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IZA Working Paper, No. 9342.
- Manser, M. & M. Brown(1980), “Marriage and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 bargaining analys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1(1):31—44.
- McMillan, J. & C. Woodruff(2002), “The central role of entrepreneur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3):153—170.
- Minniti, M. & C. Nardone(2007), “Being in someone else’s shoes: The role of gender in nascent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8(2):223—238.
- Minns, C. & M. Rizov(2003),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Ethnicity, religion, and self-employment in early 20th century Canad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2(2):259—281.
- Mookherjee, D. et al(2012), “A theory of occupational choice with endogenous fertil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4(4):1—34.
- Parcel, T. L. & E. G. Menaghan(1993), “Family social capital and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6(2):120.
- Pencavel, J. (1986), “Labor supply of men: A survey”, in: O. C. Ashenfelter & R. Layard(ed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North-Holland.
- Qian, N. (2009), “Quantity-quality and the one child policy: The only-child disadvantage in school enrollment in rural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973.
- Ruef, M. & N. M. Carter(2003), “Errata: The structure of founding teams: Homophily, strong ties, and isolation among U.S. entrepreneu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2): 317.
- Verheul, I. et al(2006), “Explaining female and male entrepreneurship at the country level”,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18(2):151—183.
- Wei, S. & X. Zhang(2011), “Sex ratios,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800.

(责任编辑:杨新铭)

(校对:谭易)